

文献可征

宋代史籍丛考

王瑞来 著

王瑞来学术文丛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尽管孔子讲的「文献」不尽指书籍，这里就作后世通行的意义理解。文史研究与考证，文献至关重要。文献不足，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时即使文献充足，但现存文献从作者到内容又存在很多问题，难以利用。因此，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成为研究的基础作业。本书就属于这样的基础作业。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王瑞来学术文丛

文献可征

宋代史籍丛考

王瑞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王瑞来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8

(王瑞来学术文丛)

ISBN 978-7-5440-7752-1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史籍-考证-中国-宋代 IV. ①K24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0701号

文献可征

——宋代史籍丛考

WENXIAN KE ZHENG

出品人 雷俊林
出版策划 孙轶
责任编辑 杨文
复审 郭志强
终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王春声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035711 邮编:030002)

印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37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40-7752-1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7337712

自序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尽管孔子讲的“文献”不尽指书籍，这里则权作后世通行的意义理解。

文史研究，文献至关重要。常言讲论从史出，这个史便是史料，便是文献。离开文献的立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天马行空而无根基。文献不足，亦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文史，往往需要竭泽而渔，一条史料漏过，证据链断裂，大厦坍塌的危险性都存在。文献丰富，则可以左右逢源，呼风唤雨，得心应手。然而，除了少量人皆援引的“大路货”，多数文献还处于未加整理考述的原生态，因此，有时即使文献充足，但文献从作者到内容又存在很多问题，也难以利用。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成为文史研究的基础作业。本书就属于这样的基础作业。

并非因为我出身于古典文献专业，才耽于文献。从事文史研究，我一直下的是笨功夫，一句话一句话地读过，读解，考证，整理文献，论证史料文本的可靠性。自然，在此过程中，也会生发问题意识。因此，我的研究最先形成的，往往是基础性的文献考证文章，然后才是论述性的成果。

本书汇集的，就是我历年所撰关于宋代史籍的考述文章二十篇。有对宋朝国史的史籍考述，诸如《宋史》《隆平集》《宋会要辑稿》；有对国史衍生史籍的考述，诸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宰辅编年录》《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有对地志

的考述，诸如《元丰九域志》《吴郡图经续记》；有对广义史籍笔记类书的考述，诸如《钱塘遗事》《宋朝事实类苑》；有对稀见史籍的考述，诸如《御试官日记》、宋代玉牒。还有以宋代为例，对《四库全书》问题的发覆，并有一文专门阐述对石刻史料的认识。

与士大夫政治互为因果，宋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史学昌盛时代。有《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巨著问世，有纪事本末这样史书体裁的出现。官修私纂，星汉灿烂。本书所及，仅限于有关宋代历史的一小部分史籍。关于宋代史籍的考述研究，还有极大的扩展空间。

考述内容，因书而异。有史籍概述，有内容辨误。虽然我想尽可能地不写得过于枯燥，但由于既不是汪洋恣肆的宏论，也不是人物事件的生动描述，只是一些对史籍的基础性考述，读起来未必有趣。不过，要想了解并使用这些史籍，则一定有用。通过这些基础作业，不仅可以廓清存留问题，也能使研究者更为清楚这些史籍之短长，更为放心自觉地使用。

我的文献研究目标并不高，仅仅是使文献足信，文史能征。研究者利用我的考述，就不必再过多地去下我的笨功夫，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更高层次的广范围研究。

不求石破天惊，不求一飞冲天，为己为人，善小而为之，我自己也得益于这样的文献研究，许多重要的议题，都是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聚沙成塔，有为的研究者可以在塔尖上起舞。

本书所收文章多散见于各种学术杂志，历年弥久，尽管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检索手段，但有些还是颇难寻觅。现在能汇集于一册，再度面世，我和读者皆当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资深出版人孙轶先生及责编杨文、樊爱香的襄助。小书本身犹如一块碑刻，铭记着他们对学界、对文化的贡献。

王瑞来

甲午仲春之识于千叶寓所

目 录

漫说《宋史》	1
《隆平集》释疑	8
《隆平集·夏国传》笺证	35
《宋会要辑稿》证误	
——《职官》七八宰辅罢免之部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佚文辑考	7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略论	89
《宋宰辅编年录》考述	99
当代人的近代史	
——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	128
《宋季三朝政要》考述	156
《宋季三朝政要》辨误	173

《元丰九域志》点校本述评	206
《吴郡图经续记》考述	215
“镜古孰非殷监呈” ——《钱塘遗事》考述	226
《宋朝事实类苑》考杂	244
赵抃《御试官日记》考释 ——兼论北宋殿试制度的演变	253
宋代玉牒考	271
“尽信书不如无书” ——透过《朝野类要》看《四库全书》对文献的改窜	310
如此《四库》：馆臣擅改文献举隅 ——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为个案	327
编书中的政治 ——《四库全书》本“违碍”文字改动个案透视	357
石刻难以尽信 ——以宋人所撰碑志为例	364
参考文献	374
文丛跋语	388

漫说《宋史》

洋洋八百万言，煌煌四十巨册，多达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中篇幅独占鳌头，我国古代最长的纪传体官修正史——这就是《宋史》。然而，元人修纂的这部《宋史》，并没有以其鸿篇巨制赢得令名，反倒获得了“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繁芜杂乱”之称，也许是笔者在工作之暇喜欢翻翻《宋史》的缘故，每每看到古今人把《宋史》骂得一无是处，便隐隐有些不平，总想找机会为这部史学巨著说几句公平话，以消胸中之块垒。

一、《宋史》并非先天不足

较之前代，宋朝的修史制度相当完备，专设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每一朝皇帝在位时，对于君主记言记动，有起居郎与起居舍人逐月修成的《起居注》；对于君臣奏对、宰臣议政，分别有中书、枢密院逐月修成的《时政记》。如果说《起居注》与《时政记》还只是修史的原始资料的话，那么，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以及进奏院、三司等各方面提

供的资料，按月编纂的《日历》，则已具有国史资料长编性质。《日历》属编年体，但其中“文臣自宰执至卿监，武臣自使相至刺史”，“修立臣僚传”。而《实录》又是在《日历》的基础上编纂的。在《实录》之后，又修有《会要》。如此完备的修史制度与丰富的史料，为宋代国史的修纂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在宋代，每一朝皇帝死后，嗣君照例下诏置修史院，命宰臣提举修纂前朝国史。两宋从太宗到理宗，代代相传，共修成十三朝国史。计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卷数未详。

元朝灭宋，宋朝国史及其他各类官修史书并没有毁于兵燹，悉数为元人获得。《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载：“时翰林学士李盘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这五千余册“宋史及诸注记”，就是日后元修《宋史》的基本资料。

由此可见，《宋史》并非先天不足，而是具有雄厚的史料基础。修纂史书，患在史料匮乏。史料完备，便可以说已成功一半了。至于另一半，则要看修纂者的才、学、识。那么，元人是怎样修纂《宋史》的呢？

二、问世艰难，后天失调

《宋史》这个成熟的胎儿，问世却颇为艰难。现在的《宋史》，是元朝末年修竣的，这并不是说元朝不重视修史。元灭宋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就曾下诏通修宋、辽、金三史。此后，元仁宗延祐年间、元文宗天历年间，又屡加诏修。袁桷曾上过《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虞集也曾奉命修辽、金、宋三史，但由于元朝内部一直在修纂三史的体例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派

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持有这种意见的大抵是由宋仕元的知识分子；另一派则认为“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持有这种意见的大抵是元人。双方持论不决，致使多次诏修的《宋史》，长期不能定稿。直到元末至正三年（1343），元顺帝看到意见实在不能统一，就决定“宋、辽、金各为一史”，这样就没有谁为正统的问题了。因此，长达几十年的修史义例之辩也就止息了。于是，在“纪、传、志、表本已完备”的情况下，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至正五年（1345），便告修竣。

有人把《宋史》的繁芜归咎于匆匆草成，当然，这也是一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修纂人员长期在义例问题上兜圈子，这些修纂人员如铁木儿塔识、欧阳玄、张起岩等又都是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并没有在史书的体例统一、前后照应、史料剪裁等方面下多少功夫。这也是造成《宋史》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匆匆编成的《宋史》，除了在史料上对宋度宗以后的史事略有补充外，几乎是一仍宋朝国史之旧。宋朝国史详于北宋，略于南宋，现在的《宋史》也是如此。并且元朝史臣在史料剪裁上也多有失当之处。如在宋朝国史中，《张宪传》《牛皋传》均为《岳飞传》的附传，而修纂者却硬行割裂出来，致使《张宪传》的第一句话就是没头没脑的“张宪，飞爱将也”。而本应在《岳飞传》之后的总叙岳飞之功的一段话，却依然保留在《牛皋传》之后，显得不伦不类。此外还存在前后抵牾、有目无传、一人两传等许多问题。如《宋史》卷三五七有《李熙靖传》，而在卷四五三还立有《李熙靖传》，考其事迹，实为一人，并非偶同姓名。元朝史臣在编纂《宋史》时主要做了一项工作，就是给许多传记加了赞语。就连这项工作，由于他们是以道学观点作为议人议事的是非标准，也常常不符史实。

因此，从史学编纂学的角度来看，《宋史》体大而思不精，的确难称良史。然而，《宋史》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一无是处呢？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呢？

三、横看成岭侧成峰

元修《宋史》是以宋朝旧有国史为底本略加编次而成，这一点，在《宋史》中尚有许多痕迹可寻。如《天文志序》云：“今合累朝史官所录为志。”《礼志序》云：“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艺文志序》云：“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道学传序》云：“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由此可见，《宋史》确系从宋朝国史脱胎而来。

元人修《宋史》，对宋朝国史不加剪裁和编排失当，从史书编纂学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然而，在宋朝国史今天均已亡佚的情况下，由于当时元人的“手懒”，反倒给今天保存了一部基本完整的宋朝国史。在客观上，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吗？试问，现在的二十四史中，有哪一部史书基本完整地保存了那一朝国史的面貌？只有《宋史》。这就是《宋史》的价值所在。《宋史》在史学史上不称良史，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则是宝贵的宋代史料集萃。设想一下，倘若《宋史》也是严格依照正统史书的体例，精心编纂、剪裁而成，其良固良矣，然而其史料价值恐怕就没有现在的《宋史》这么大了。因此，对《宋史》的评价，似不应以“一管掩大德”。

当然，对于今人来说，一部史书编纂有体，剪裁得当，义例谨严，从史学史上会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不要忘了，人们的评价标准，绝不仅仅停留在欣赏或赞美其形式的完美无缺上，更主要的，人们是把目光盯在内容上，即从古代的史书中撷取史料，作为研究之资。因此，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宋史》正因为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批较为原始的、少有修饰的史料，才显得更为可靠，更有价值，更为宝贵。当然，《宋史》修纂人“无心插柳”的如许“功劳”，并不能给他们史学编纂方面的“才学识”增添多少光彩。

向称《宋史》繁芜，这也是偏颇之见。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史书的篇幅长些，并不算是缺点。诚然，作文之法贵乎简，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倒是不嫌其繁，唯恐其简。丰富的史料，正可以使研究者如蛟龙入海，左右逢源。因此，即便是从史学史的评价上，对于《宋史》批评其芜杂尚可，针砭其繁冗欠妥。

纪、传、志、表之间记载多有抵牾，这一点也使《宋史》备受责难。对于《宋史》前后抵牾的现象要做些分析。固然，这是由于元人修史前后照应不够所造成的，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庞大的《宋史》各个部分史料来源不一造成的。根据笔者考证，《宋史》的本纪部分，采用《十三朝帝纪》；志的部分采自国史；列传虽然也来自国史，但在国史之前多源于碑传墓表行状之类；《宰辅表》源于私家撰述的宰辅拜罢之书；《宗室表》源于玉牒所修撰的属籍，等等。一部《宋史》，实际上等于是多部史书的组合，官私著述混杂于一体。因此，在史事的记载上难免抵牾。然而，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记载各异，倒是给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比勘参稽的余地与进一步探讨的线索，使研究者可以开阔眼界，在重重的历史迷雾中，或许会发现某些闪烁着历史真实的折光。所以，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宋史》的记载抵牾，也不能算作一条缺点。

脱胎于庞大的宋朝国史的《宋史》，“身躯”也同样庞大。在二十四史中，《宋史》创造了多项之“最”：列传最多，达两千多人，其中的《道学传》亦属首创；志的篇幅最大，其中《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十二卷，相当于《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详尽的记载，丰富的史料，为今天人们考察宋代社会提供了方便。

四、补阙勘误待后人

《宋史》问世后，陆续产生了不少改撰之作，如《宋史记》《宋史存》

《宋史质》《宋史新编》等。这些出自明人的改撰之作，对《宋史》虽有一些纠谬补遗与考订，但多是出于民族意识与正统观念，在义例问题上做文章。如改为以宋为正统，辽、金附之，置于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这些书史料价值都不大。

20世纪60年代，《宋史》才开始了真正的整理，但也历经坎坷，聂崇岐、邓广铭、罗继祖等前辈学者都曾参加过《宋史》的整理点校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宋史》整理工作中辍。后由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组织人员，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才将《宋史》整理出来，使这部史学巨著第一次有了标点排印本。

这个排印本，经过了多人多年的整理，根据现存古代文献，校出了大量的《宋史》原书之误和在版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诚然，古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现在的整理本《宋史》，仍不断有人指出其失校之处与“旋扫旋生”之误。但是，能够把这么一部大书整理出来，已是嘉惠学界，功不可没。

《宋史》新点校本再度印行，又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做了尽可能的修改。然而，此书的彻底整理，犹有待来者。

五、此书堪查不堪读

笔者研治宋史有年，常常同宋史界的朋友们谈及如何利用《宋史》。可以想象得出，刚刚接触《宋史》这个庞然大物，的确有些怵头。经过几年的摸索，笔者认为，《宋史》除了必要的章节，作为了解宋史的基础知识，一定要认真阅读之外，这部书基本上是供人查的，而不是让人读的。比如说，长达三千页的《宗室世系表》去读它干什么？即使是其他章节，如果当你的头脑中对宋史的脉络空空如也的时候，读了也基本上等于白读，枉费功夫，除了留下模模糊糊一片之外，可以说收获绝不会很多。只有研究到某个问

题，带着问题去查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就会把为了解问题而阅读的那部分内容记得很牢。这样，一次是一个点，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多了，点就连成了线，对一部偌大的《宋史》也就不会感到那么生疏了。笔及于此，忽然想起了郑板桥的一副对联：“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隋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话虽不中听，对人却颇有启迪意义。

由于《宋史》各部分的史源不同，一部《宋史》等于多部史书，不可以当做一个整体看，因此，在考察一个问题时，必须把《宋史》多翻翻，从对同一史事的各种不同的记载中，寻觅庐山真面目。否则，盲目地作为官修正史而曲信其记载，就有可能上当。就是说，对《宋史》中的史料要有比较、有鉴别地运用。

另外，使用《宋史》这部书，要注意利用索引。在人名方面，有《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其中凡是《宋史》中有传或有附传的人物均可查得。还有《宋史人名索引》，这本索引对《宋史》中所有宋代人物原则上说是靡有遗漏。在专书方面，日本学者曾编有《宋史职官志索引》《宋史选举志索引》《宋史食货志索引》等。索引像一把钥匙，通过它，可以打开古代文献的宝库，使“死书”变成“活书”。利用索引，是使用古代文献的捷径。

《隆平集》释疑

引言

在传世的宋代典籍中，有一部颇有聚讼的书，这便是《隆平集》。称之为“集”，不了解内容的人，或许会将此书视为集部的文集一类。其实，治史者皆知这是一部史书。名与实未必一致，常有距离，对于书籍，亦不可“望名生义”。

《隆平集》当是略称，据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国史类》^①和罗愿《新安志》^②卷五的记载，全称当作《五朝隆平集》，亦有题为《皇宋隆平集》^③者。由于略称业已约定俗成，因此也不拟正名，给人以陌生感。五朝，

①〔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8页。

②〔宋〕罗愿：《新安志》卷五，合肥：黄山书社，萧建新、杨国宜校注本，2008年，第158页。

③明董氏万卷堂刊本《隆平集》卷首所载宋人赵伯卫序，题作“皇宋隆平集”。

指的就是北宋最初的五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隆平”者，兴隆太平之意，言盛世也。的确，太祖、太宗开国；真宗时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换得长久和平；仁宗四十年无为而治，任由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英宗短短四年，平静走过。其间虽不无政治问题或社会动荡，但基本属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太宗时编纂的书籍，多称“太平”，譬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此虽与太平兴国的年号有关，更多的是一种对太平的期待。是书名为“隆平”，还有南宋人编纂的《太平治迹统类》^①，则既是歌颂，也是对既有历史的承认。其实，“隆平”二字，也隐括了年号。“隆”者，可以视为截取自记事之始太祖开基年号“建隆”；而“平”者，则是截取自记事之末英宗年号“治平”。以“隆平”名书，足见撰者之匠心独运。

然而，降至后世，主要是由于存有聚讼，这部重要的典籍一直被冷落。较之其他文献，不仅刊刻甚少，研治者亦寡。本文拟就《隆平集》一书的撰者，展开多层面之考察，以期廓清谜团，并将《隆平集》与《东都事略》《宋史》等记载北宋史事的典籍在内容上深入比勘，揭示其史料价值。然后通过此一比较，对《隆平集》的性质试加重新定位。最后，还将缕述自宋以降之刊刻源流。

一、撰者之谜

《隆平集》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历来为治史者所认可。不过，在提及此书的撰者时，却多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因为治史者大多知道关于《隆平集》撰者问题的聚讼，所以不大敢大大方方地写下撰者的名字。

本来，《隆平集》的著作权属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这在宋代几乎毫无疑问。不过，书中的一处记载让南宋初年的一个藏书家发现，大惑不解，

^① [宋]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

便怀疑这部书不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曾巩。这个藏书家就是晁公武。他在《郡斋读书志》卷六介绍《隆平集》时写道：

《隆平集》二十卷，右皇朝曾巩撰。记五朝君臣事迹，其间记事多误，如以《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类，或疑非巩书。^①

晁公武的上述质疑，仅见于被认为是初稿本的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在视为定稿本的袁州本中，仅记有“《隆平集》二十卷，右皇朝曾巩撰，记五朝君臣事迹”短短一句。“其间记事多误，如以《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类，或疑非巩书”已被悉数删去。可见，对《隆平集》的质疑，只是晁公武的最初认识，最后还是删除质疑，以求稳妥。不过，白纸黑字，晁公武的质疑还是伴随着衢州本存留了下来。《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录《郡斋读书志》的《隆平集》解题，即是衢州本，原封不动地移录了对《隆平集》的质疑。这个质疑，到了四库馆臣那里，又被大加发挥。

编辑《四库全书》之时，正值乾嘉之学开始形成，疑古蔚成风尚。所以在撰写《四库提要》时，馆臣便对质疑如获至宝，附益旁征，又胪列出以下证据来进行证伪：《宋史》曾巩本传不载此集；当时人所作曾巩行状并神道碑亦未云及；曾巩虽曾与修五朝史，然仅短短五个月时间，不容遽撰以进。最后，十分肯定地做出结论：“其出于伪托，殆无疑义。”^②四库馆臣撰写的《四库提要》不仅代表官方定论，并且也是当时一流学者的认识，这无疑显示出很大的权威性。清代有名的学者姚际恒就很服膺《四库提要》的说法，也说“其为伪托无疑”^③。

对于《隆平集》撰者伪托说的种种证伪，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四库

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孙猛校本，1990年，第267页。

②〔清〕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47页。

③林庆彰主编：《姚际恒著作集》，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第5册《古今伪书考》卷二，第12页。